

## 編後語

中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促進了社會的多元化。如果說，極權主義或全能主義的特徵是國家穿透並控制了社會，那麼過去三十年中國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告別極權主義。隨着社會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國家的社會控制機制必然發生變化，相關的公共政策也會隨之發生轉型。然而，這樣的變化和轉型在不同的社會生活領域呈現很大的差異。

本期的「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考察了中國政府社會控制制度及有關公共政策的轉型。戶口制度可謂歷史悠久，但是在中國演變成爲一種具有社會控制、社會動員與資源配置多功能的社會制度，還是發生在全能主義時代。迄今爲止，正如王飛凌所描述，戶口制度一直是中國最爲人詬病又最少根本變革的毛澤東時代遺產之一。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其變革只是停留在反應性的調整。爲了維繫其核心的社會控制機制，戶口制度的基本架構沒有發生多大變化，並且在很多方面阻遏着中國各方面的社會經濟變革，也阻礙着執政黨的施政。

曾幾何時，宗教生活在中國受到了全面壓制，改革開放改變了這種局面。然而，即使在今天，世人對宗教在中國的命運，依然停留在缺乏宗教自由的印象之中。這種刻板印象的形成，多與國家與天主教、基督教的緊張關係有關。趙力濤全方位地描述了五大宗教和民間宗教在中國復興的情形，以及國家的宗教政策在其中的積極作用。毫無疑問，國家宗教政策的轉型一方面爲民眾宗教生活的豐富讓出了空間，但另一方面控制宗教爲國家目標服務，或者說嚴防宗教自由的發展導致社會脫離國家的控制，依然是當今中國宗教政策的主軸。

在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少數民族政策是另一個影響中國社會生活的重要公共政策領域。如果多民族混居在一起，那麼民族政策的主軸便在於建立公平的制度框架，實現多元文化的共榮和共融。然而，如果存在着少數民族的聚居區，而且在這個地區又存在着分離主義的思想和運動，更有甚者分離主義運動又以暴力或恐怖主義的形式出現，那麼少數民族政策、區域自治政策、反恐政策、多元文化政策將會交織在一起，造成極爲混沌的局面。實際上，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哈日巴拉以新疆民族自治權的制度建設所遭遇的困難，陳述了民族國家建設過程中這一內生的難局。

本期的多篇文章，展示了不同生活與意義世界之間的衝突。徐華述說了中國商業傳統與西方商業理念的衝突；高毅描述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史學與法國非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意識形態和學術衝突；程平源分析了農民上訪事件中傳統正義理念與現代維權行動的衝突；周雷則感慨於藏區少數民族宗教信仰、情懷與執政者話語體系的衝突。彌合這些衝突，或許是根本不可能的。那麼，找到不使這些衝突擴大化以致影響我們正常生活的平衡之道，才是至爲關鍵的。